

危機籠罩的陰影而日益走向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融合的新獨裁統治的時代中，他們的努力終將無力回天。

研究美國南北戰爭的唐納德 (David H. Donald) 認為，「治史者往往跟隨勝利軍隊的營帳而行」(Henry S. Commager, *The Nature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Books, Inc., 1965], 47-48)。那些經歷了王朝易代的遺民，因背負了前朝的烙印，注定在新朝的歷史書寫中處於陰暗角落。在當下這個日新月異的「新新時代」，道德失範與社會斷裂的隱患

被掩蓋在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中的一員，參與世界、分享利益的樂觀表述中。在為當代「現代化」發展尋求(抑或只是提供?)歷史論證的「研究成果」屢見不鮮之時，作者獨闢蹊徑，用歷史多稜鏡聚焦於這群長期被「現代」話語負面表述的清遺民，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去理解這個經歷了從「帝制」到「共和」之大變局的群體，在一個日益「現代」的社會中的內心彷徨與焦慮。他們注定被時代的洪流淹沒而無法成為弄潮的舵手。而他們對時代的冷眼洞察，在百年以後的今天，依然具有發人深省的穿透力。

作者獨闢蹊徑，用歷史多稜鏡聚焦於這群長期被「現代」話語負面表述的清遺民，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去理解這個經歷了從「帝制」到「共和」之大變局的群體，在一個日益「現代」的社會中的內心彷徨與焦慮。

史料共鑒別 疑義相與析

● 盧 毅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

近日讀到秦福銓著《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以下簡稱《博古和毛澤東》，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作者是博古(秦邦憲)的侄子，該書是其遺著，主要記述了他從父親楊琳(即博古之弟秦邦禮)和潘漢年、嚴樸等知情人那裏聽來的「歷史故事」。筆者讀後，覺得這是一部頗有意思的口

筆者覺得《博古和毛澤東》是一部頗有意思的口述史，作者是博古（秦邦憲）的侄子，該書是其遺著，可以引發出對一些老問題的新思考或激起新的爭鳴，不過書中有些說法可能也存在問題。

述史，可以引發出對一些老問題的新思考或激起新的爭鳴，不過書中有些說法可能也存在問題。茲簡介如下，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共鳴與回應。

一 解開張聞天「總書記」之謎的一個新旁證

長期以來，黨史界在張聞天是否擔任過「總書記」這一職務問題上聚訟紛紜，大致有兩種意見。否定者認為，迄今尚未發現有確鑿的原始檔案能證明張聞天當過總書記，而相反的文獻卻有兩份：一份是張聞天本人1938年4月9日致長江局的電報，提出對《救亡時報》在發表採訪他的記錄時，將其稱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一事，應作如下聲明：「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12日，武漢《新華日報》根據這一指示刊登了〈張聞天（洛甫）啟事〉：「中共中央設有數同志組織之書記處，並無所謂總書記。」（韓泰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職務稱謂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6期，頁87。）另一份是1982年發現的陳雲早年寫的〈（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其中亦未提選舉總書記一事，而只是說「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43）。鑒於此，張聞天「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

稱之為總書記）」這一措辭，遂成為一種通行說法。

然而，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人堅信張聞天當的就是「總書記」而非甚麼「負總責」，尤其是何方在《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一書中詳細論證了這個問題。另有李慶英〈張聞天「總書記問題」揭秘〉、張培森〈為張聞天總書記正名〉等文（分別載於《黨史文苑》，2006年第3期，頁6-13、《炎黃春秋》，2006年第7期，頁9-18），對此問題也旁徵博引、辨析甚詳。不過從他們列舉的材料來看，主要是根據1972年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講話、1979年鄧小平在張聞天追悼會上的悼詞，以及楊尚昆、劉英、伍修權、彭德懷、黃克誠、李德（Otto Braun）、斯諾（Edgar Snow）等人的回憶，並非最初的原始材料，說服力仍較有限，故這一疑案尚難有定論。

而《博古和毛澤東》一書的出版，或許給這一懸而未決之謎提供了一個新解。儘管作者本人可能並非有意識要解開此謎，但他還是留下了三點資訊：

其一，該書「遵義會議」一節寫道：「張聞天提出總書記一職是否改選，毛澤東意見不急於改選，等大家都平靜之後，在適當時候再考慮。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暫時仍由博古擔任。」（頁121）

其二，在書中附錄〈有關「故事」來源的說明〉中，秦福銓回憶：他曾聽父親說，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上總書記，但周恩來不承

認，結果選舉作廢。後來他被共產國際批准為總負責人，始終沒有總書記名份」(頁203)。

其三，協助整理文稿的李海淵(博古女婿)在〈後記〉中也補充了一個細節，秦福銓說嚴樸曾告訴他：「遵義會議開到最後，張聞天提出博古不適合再當總書記，應該改選。一些人提出選張聞天，而且毛澤東也同意。要表決時，周恩來堅決反對，認為這個會議改選總書記不合適，甚至提出非要選舉，他就退出會議。由於周舉足輕重的地位，毛澤東也放棄了原來的意見，建議以後再說。最後會議統一認識，改選這件事保密，不要對外再提。所以會後仍由博古主持政治局常委會。」(頁213)

從文字表述來看，以上三處資訊似乎存在一些相互抵牾之處，例如，第一處說毛澤東不贊成改選而周恩來只不過是附和了毛的意見，第三處卻說毛澤東同意改選而周恩來堅決反對。又如，第二處說張聞天已經被選上總書記，只是周恩來不承認，而第三處卻說付諸表決前就被周制止。此外，第二處說此事聽自其父親，而第三處卻說是聽嚴樸講的。這種在同一本書中前後矛盾的現象，確實說明實錄口述之難，需要更細緻縝密的核實查證，文字表述亦須嚴謹，否則便難以徵信，反倒容易湮沒了一些彌足珍貴的史料。

不過總體而言，以上三處資訊都談到一點：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幾乎當選總書記；而最終未能實現改選，周恩來在其中起了關鍵作

用。這一記述應該是基本可信的，也符合周恩來當時在黨內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他後來在雞鳴三省通過推心置腹的深談，成功打通博古的思想，勸其將中央權力交給張聞天，更是印證了這一事實。至於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是否曾以退會堅決反對改選，或者不承認選舉結果、導致選舉作廢，實難求證。一則該書的兩種說法本來就不一致，令人不知孰為可信；二則此種剛烈之舉似乎不符合周恩來的處世風格，更難以解釋不久後他為何又勸博古交權(頁125-31)。不過，從這一故事的口述者來看，無論博古還是楊琳或嚴樸以及秦福銓等人，似乎皆無作偽之必要。故真相究竟如何，只好姑且存疑，有待其他新史料的發現。

另外，秦福銓上述回憶還首次明確披露了一個以前鮮為人知的內幕：張聞天後來雖然被共產國際批准為總負責人，但始終沒有總書記名份。這一說法實際上與陳雲的說法相吻合，同時又進一步明確指出張聞天「始終沒有總書記名份」。儘管此說目前僅是孤證，而且同樣是後人的口碑材料，是否可信尚待證實，但它畢竟為解開張聞天「總書記」之謎提供了一個新旁證，不妨視為一家之言。尤其是此說來自楊琳，他曾於1935年隨陳雲赴莫斯科，「協助嚴樸整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來往文件」(頁191)，對有關情況比較了解，故而可靠性較高。

根據這一資訊，我們或許可為張聞天「總書記」問題作出一個解釋，即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張聞天

長期以來，黨史界在張聞天是否擔任過「總書記」這一職務問題上聚訟紛紜，而《博古和毛澤東》一書的出版，或許給這一懸而未決之謎提供了一個新解。張聞天後來雖然被共產國際批准為總負責人，但始終沒有總書記名份。

目前通行的張聞天「負總責」的提法比較恰當的。無論是「負總責」還是「總書記」，都顯然是指中央一把手、最高領導人，這一點誰也沒有否認，關鍵是如何措辭才最符合歷史事實。

雖然替代了博古的領導地位，負起中央總的責任，後來也獲得共產國際的承認，但並未擔任過總書記職務。至於箇中原因，應是中共高層自身的決定，而非共產國際的干涉。這在中共歷史上亦有過先例，如1931年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時，周恩來便因盧福坦欲當總書記而索性不設該職位，指定博古負總的責任。考慮到毛澤東、周恩來在遵義會議期間也將張聞天視為一個臨時過渡人物（頁129-32），故循舊例有意不設總書記也是極有可能的。此後時過境遷，總書記一事亦不再提起。

由此看來，目前通行的「負總責」提法比較恰當的。即使從情理來推論，也沒有着意抹煞張聞天曾任「總書記」一職的必要。因為無論是「負總責」還是「總書記」，都顯然是指中央一把手、最高領導人，這一點誰也沒有否認，關鍵是如何措辭才最符合歷史事實。而恰恰在此問題上，筆者認為那些肯定者不免過於拘泥。從他們列舉的諸多材料來看，可以說充分證明了張聞天曾經是中央的一把手，但從邏輯上並無法駁倒「負總責」之說。

筆者以為，最有利於肯定者的一則史料應是：1936年6月16日，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簽發電報，通過中共代表團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央到達陝北後黨和紅軍的全面情況。其中談到黨的領導機構時說，「現在中央集中的組織，政治局：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鄧發、凱豐、稼祥、仲丹、德懷，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張培森主編：《張聞天

年譜》，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333。）僅此一條便已足以證明張聞天是當時黨內最高領導人。但「書記」畢竟不能完全等同於「總書記」，所以只憑這條材料，仍無法得出其擔任過「總書記」一職的結論。

至於許多人在回憶中將張聞天稱為「總書記」，包括張聞天本人1943年寫的〈反省筆記〉在敘述相關史實時亦始終用「總書記」一詞而非「負總責」，這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能是習慣使然。如前所述，張聞天曾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書記。或許正因此，許多人包括他自己都將之視為「總書記」。這其實也是正常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實際上，爭論雙方意見分歧的癥結或許正在於，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上討論「總書記」一詞，是正式稱呼還是習慣用法？如果是前者，應承認目前尚未見到確切史料；而如果是後者，則不妨徑直稱之。因此綜合來看，張聞天「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的提法，應該說還是比較客觀嚴謹的，在沒有發現有力的反證材料之前，是基本上能站得住腳的。

至此，張聞天是否擔任過「總書記」一職之謎可謂有了一個新解，而這在史料方面確實要感謝秦福銓此書提供的這則新旁證。

二 其他新說法以及可能存在的問題

《博古和毛澤東》一書還記述了一些不同於以往黨史的說法，有些

或許屬實，而有些也可能存在着一定問題。但無論如何，都引起了新的爭議。以下依原書所述順序分別概述之，並附簡略按語。

(一) 該書提到，共產國際來電要求中央派人去莫斯科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提出由王明擔任(頁7)。

過去提及此事，大多說是王明自己主動提出要去莫斯科，更有甚者還斷定王明害怕呆在國內危險，故請米夫(Pavel Mif)將其調往共產國際。但此說純屬主觀臆測，並無真憑實據。而如果秦福銓所述屬實，這一誅心之論則可不攻自破。然秦書亦未說明其材料來源，甚至是得自口述還是根據某種文獻也未作交代，這種現象的確是該書的一大缺陷。

(二) 書中在談及長征出發前的情況時說，博古決定輕裝上路，將機關人員分散到各軍團，並盡量減少輜重物質。但這一意見遭到毛澤東、張聞天的反對，結果只好抬着「二頂轎子」走路，延誤了過湘江的時間，造成湘江之戰的重大損失(頁97-98)。

以前提到「抬轎子」，都將之歸咎於博古等人的愚蠢決定，如今秦福銓提出乃是毛澤東、張聞天的建議。恕筆者孤陋寡聞，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說法。而且據該書披露博古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和周恩來在雞鳴三省與博古的談話內容(頁115、125)，此事又似非杜撰。內幕究竟如何，可謂雲霧繚繞，尚有待進一步考證。

(三) 該書述及湘江慘敗後博古

拔槍一事。關於此事，過去都認為博古羞愧難當、意欲自殺，而秦福銓則說博古是對毛澤東等「小三人團」的阻擾十分氣惱，拔槍喊道：「我恨不得把他們一個個槍斃了。」後雖遭伍修權勸阻把槍收起，仍恨恨地說：「總有一天我會跟他們算這筆賬的。」(頁105)這與傳統說法也有很大出入。因書中未說明其依據，故是否可信難以判定。

(四) 書中存在着幾點明顯的史實錯誤：

其一，時間。整理者李海淵在〈後記〉中說，原稿採用了大量精確到「日」的時間，很多是作者秦福銓的考證，據他說有的是他推算的。後來據李海淵建議，盡量改用了「月初」、「下旬」等寬泛的用詞(頁209)。這一建議是很妥當的，避免了一些爭議。但就目前書中保留的時間記載來看，仍然存在個別舛誤。如顧順章、向忠發的被捕時間，應分別為4月24日和6月22日，而書中卻誤為4月28日和6月20日(頁7)。

其二，人物。該書有一張插圖，是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合影，將前排左二誤認為朱德，其實應是凱豐。照片說明中還有一句：「凱豐與會，但未參加合影」，更是明顯有誤，實際上是朱德未與會(頁11)。

不過就全書而言，以上幾處缺陷仍是瑕不掩瑜。至少書中提供了不少新史料，足以讓人耳目一新，引起重新思考。筆者所述僅是拋磚引玉，有興趣的讀者還是去閱讀原著並詳加考辨吧。

許多人在回憶中將張聞天稱為「總書記」，包括張聞天本人1943年寫的〈反省筆記〉在敘述相關史實時亦始終用「總書記」一詞而非「負總責」，這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能是習慣使然。